

成都市“农家乐”演变的案例研究

——兼论我国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发展

何景明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

[摘要] 本文通过对成都市“农家乐”经营模式、经济效益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的演变轨迹的勾勒, 分析了我国城市郊区乡村旅游的发展。研究发现, 成都“农家乐”已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 娱乐服务设施逐渐与度假村趋同; 与此同时, 在外来投资者的竞争下, 本地农户经营者的效益普遍下降, “农家乐”经营的“飞地化”特征日渐突出。创新开发模式, 加强政府对“农家乐”的引导和规制, 成了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 乡村旅游; 演变; “农家乐”; 成都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05)06-0071-04

成都是一个具有休闲传统的城市, 乡村旅游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当地人称之为“农家乐”。“农家乐”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 游客娱乐的主要方式为赏花采果、麻将棋牌、喝茶聊天等。与其他旅游形式相比, “农家乐”的花费低廉(一般 20~30 元/人天), 而且离城近, 交通方便, 是成都市民大众化的休闲方式之一。目前, 成都市“农家乐”已发展到相当规模, 几乎遍及郊区各县、市、区, 已成为四川乃至中国西南乡村旅游的典型和缩影。

在对成都“农家乐”发展的多年关注中, 有几点引起我的思考: 一是随着成都市“农家乐”的规模不断扩大, 一些大型的“农家乐”已发展为低档度假村, 使度假村与“农家乐”的界限不再清晰。在某种意义上,

“农家乐”已成为餐饮娱乐为一体、消费水平经济实惠的休闲娱乐方式的代名词。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乡村旅游的发展状况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城市郊区“农家乐”的开发模式将走向何方, 是否最终会被度假村取代? 二是随着“农家乐”朝规模化发展的同时, 乡村旅游由初期的“农民唱戏”转化为“企业唱戏”。农户由于资金、技术等先天不足, 难以与外来企业抗衡, 在竞争中处于弱势, 一些发展较早的农家旅游地, 农户从旅游中获取的经济利益呈下降趋势。农户是否最终被挤出旅游经营, 使“农家乐”发展成为与当地社会经济关联度很小的“飞地”? 本文试图通过揭示成都“农家乐”演变过程来探索这两个问题。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作者在成都龙泉驿区、郫县、都江堰市、双流县等地对“农家乐”管理者、经营者和游客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

1 “农家乐”经营模式的演变

1.1 “农家乐”的规模由小到大

以成都“农家乐”发源地之一的郫县农科村为例, 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992~1996 年, 以农户经营为主的小规模经营阶段, 几乎全村家家户户经营“农家乐”; 1997~2000 年, 外地投资经营户增多, 部分“农家乐”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 2001 年以后, “农家乐”经过重组兼并或联营, 形成以大户为主导的规模经营阶段(表 1)。“农家乐”的规模也从一天仅能接待 40~50 人次发展到每天可提供 400~600 人次餐饮。

1.2 “农家乐”由当地农户自发经营发展为外来者投资经营占较大比重

成都“农家乐”是以本地经营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般是夫妻经营或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经营, 家庭经营色彩浓厚。雇佣的服务员也多为邻里亲戚。每到旺季, 亲戚、邻里相互帮忙现象普

[基金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青年项目“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资助。

[收稿日期] 2005-09-02; **[修订日期]** 2005-10-12

[作者简介] 何景明(1966-), 女, 重庆人, 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与管理, E-mail: wangyi@bust.edu.cn。

遍。随着“农家乐”的扩展和效益的提高,吸引外地人和城市居民前来租地投资经营。例如龙泉驿书房村有常年经营的“农家乐”20多家,其中6户为城里人投资经营,占常年经营户的25%。成都市由城里人租地经营的“农家乐”约占总数的20%以上。

表1 郫县农科村农家旅游发展阶段

年份	“农家乐”户数		“农家乐”平均 年经营(万元) 收入
	总户数	其中:年经营收入 >25万元的户数	
1992~1996年	103	2	5
1997~2000年	60	9	18
2001年以后	23	14	26

资料来源:据郫县旅游局提供资料和实地调查整理。

城里人经营的“农家乐”一般规模大,基础设施好,在竞争中的优势日益显现。以郫县农科村为例,2000年,“农家乐”经营户60户,其中10户为外地人投资经营,占经营户的17%;到2003年,经过重组兼并,20多家经营户中,外地人已占经营户的40%,而且位置好(位于村主干道两侧),规模大,旅游收入占全村的70%以上。本村村民经营的“农家乐”除村长和村支书等几家规模大、设施较好外,其余都比较简陋,位置也比较偏僻。

1.3 “农家乐”娱乐服务设施逐渐与度假村趋同

成都最富盛名的乡村旅游地龙泉驿区的“农家乐”是从举办“桃花节”开始的。当时许多成都市民自带干粮前来看桃花,走累了、渴了,要求当地村民烧茶水、煮红薯稀饭供应。几张桌椅,几杯茶水,加上简单的农家饭,这就是成都“农家乐”的雏形。与此相类似,成都另一“农家乐”的发源地郫县友爱镇农科村,20世纪80年代由种植粮油作物到改种花木,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花卉苗圃中心,前来购买花卉的商贩要求当地村民提供餐饮,“农家乐”由此发展起来。而成都双流县的“农家乐”则是从“一鸡三吃”等特色餐饮吸引市民开始的。

随着“农家乐”的发展,游客的娱乐服务设施也发展起来。开始主要在室外庭院摆上桌椅和棋牌麻将,游客娱乐的主要方式为赏花采果、麻将棋牌、喝茶聊天等。后来增加了卡拉OK室、室外大众运动设施(乒乓球、台球、羽毛球等)、儿童游乐设施(滑梯、秋千、跷跷板、转转椅等)和钓鱼池等,但大多不提供住宿。随着“农家乐”规模进一步扩大,又增加了客房、会议室、室内豪华棋牌活动室、洗脚桑拿室等,用以接待单位会议和住宿,至此,“农家乐”的服

务设施和娱乐方式已类似于简易度假村。

2 “农家乐”的经济效应演变

2.1 发展较早的农家旅游地经济效益普遍下滑

以郫县农科村和龙泉驿区书房村为例。郫县农科村和龙泉驿区书房村农家旅游始于1992年,1996年起进入了规模发展阶段,1999年达到高峰,旺季全村客流量每天超过万人,平均每户“农家乐”接待游客200~300人/天,完全处于卖方市场。2000年以后,开始急剧衰退(图1),2003年村里游客寥落,有的“农家乐”已闭门谢客,业主普遍反映近两年经济效益严重下滑,“农家乐”处于微利经营。其他“农家乐”发展较早的旅游地,也存在类似情况。

郫县农科村和龙泉驿区书房村的衰退,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随着周边地区“农家乐”的迅速发展,旅游地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农家旅游由过去的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过去那种旺季时全村一天的游客逾万人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二是由于农户没有及时推出新的娱乐项目,“老面孔”、“老地方”自然是不能长久地吸引游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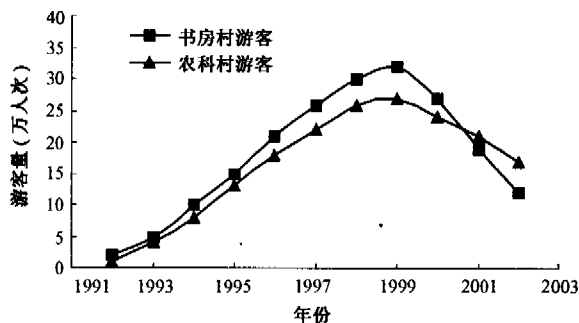


图1 农科村和书房村游客量年变化曲线

2.2 在外来投资者的竞争下,农户通过旅游获利呈下降趋势

随着“农家乐”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外来经营者增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农户经营的“农家乐”由于资金不足,更兼视野和管理水平有限,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以农科村为例,在农家旅游的鼎盛时期(1996~1999年),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经营“农家乐”,旅游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到2002年,旅游收入下降很快,占全村农户总收入的1/3左右(图2),其中相当部分是通过租赁土地、卖小商品等方式获得的收益,农户直接经营的“农家乐”数量锐减,由60多家减少至10多家,其中效益较好的只有2~3家,其余均处于微利经营。

3 “农家乐”对农村社会文化影响的演变

3.1 在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同时,也造成大量设施闲置和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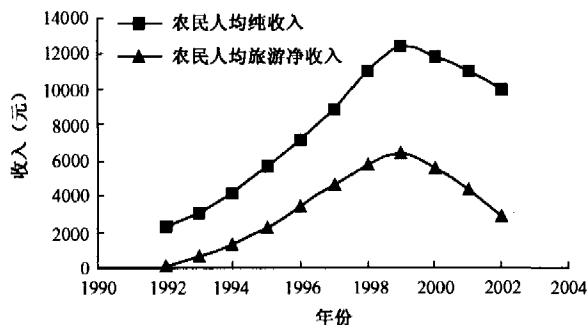


图2 成都市郫县农科村农民人均旅游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比较

尽管游客的到来对当地环境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正面的影响是主要的。由于旅游发展客观上要求发展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美化环境,而发展旅游业使农民收入增加,又为农村人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创造了条件。郫县农科村就是其中一例。旅游业的发展,开通了成都至农科村的公共汽车专线,村里的道路也得以改善并与其他村的村道连接,形成了通畅的交通网络;通讯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家家户户都有直拨电话或移动电话;村内建有专门的垃圾站和停车场;村民自觉整修庭院,更新、添置家庭设施。整个村环境优美,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农民公园”,人居环境得以明显改观。

成都“农家乐”发展初期,主要是与赏花活动相结合,季节性很强,导致旺季客源过于集中。例如龙泉驿区每年3月桃花盛开的20天里,游客量占全年的50%左右。游客密度过大不仅降低了景点的观赏质量,同时引发塞车和噪声等环境污染,旺季塞车严重时,从书房村村头到村尾5里村路,车辆通过竟需花费1~2小时,村里人声鼎沸,车鸣声不绝于耳。但花期一过,游客寥寥,大量旅游接待设施闲置,许多“农家乐”不得不停业,与旺季形成鲜明对比。随着部分旅游地的快速衰落,旅游设施闲置和浪费现象更为突出,使得“农家乐”的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大多处于微利经营状况,积极性受到很大伤害。

3.2 在促进农村“观念城市化”的同时,也因获利不均而引发矛盾

旅游业是一种顾客直接来到产品产地的产业,旅游发展促进了城乡间的文化的交流,促进农村的“观念城市化”,带动了乡村社会文明的进步。例如,应游客的要求,成都市青城镇“农家乐”的接待户,大都订阅了报刊杂志,使业主们也开始养成读书、看报的好习惯;城里游客的到来,还把城里的一些健康的娱乐、体育活动项目带来,带动了乡村文体活动的广

泛开展;村民的卫生习惯发生了明显变化,随意乱倒垃圾的现象大为减少。

旅游地开展对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复合型管理人才的成长。调查中发现,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不少农民经营者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旅游培训;有的较早经营旅游的农户经过数年的经验、财富积累和市场了解后,去外地经营“农家乐”或其他娱乐休闲项目(例如农科村最早经营“农家乐”的农户已在城里开“洗脚城”等)。

旅游发展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和冲突。一是一部分农户因经营得法而迅速富裕起来,与当地其他农户的经济收入拉开了距离,导致没有经营旅游的农户心理失衡,对游客的态度不甚友好,从而影响游客对旅游地的整体感受。二是旅游经营户之间因相互竞争而产生矛盾,如为争取游客,经营者之间相互诋毁,有的还乘夜晚将邻里“农家乐”的招牌取走;有的则雇人拉客,沿途跟踪游客,让游客不胜其烦。三是外地旅游经营者与当地“农家乐”的矛盾。外来者往往财大气粗,在经营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村民虽有所不满但又惧怕,村民不敢在外来“农家乐”附近拉客,害怕受到殴打等报复。四是旅游经营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政府在进行旅游设施建设(如修路和建设景区)往往要占用农户的承包地,由于补偿和安置不到位,导致农户失地、失业,从而引起冲突,严重时发生失地农民堵塞公路,与前来调解的政府公务员和警察大打出手。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利于旅游地的持续发展,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4 从成都市“农家乐”看我国城市郊区乡村旅游的发展

4.1 关于“农家乐”的模式

对成都“农家乐”的调查表明,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异。我国乡村旅游将走向何方?是否最终被度假村模式所取代?笔者认为“农家乐”朝着上规模、上档次发展是大势所趋,因为从调查情况看,一般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好。目前“农家乐”不会被度假村完全取代,毕竟“农家乐”所拥有的低价位是度假村难以替代的。但随着市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农家乐”价格的吸引力会逐渐减弱,“农家乐”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久地生存下去,需另辟蹊径,不断更新发展模式。

例如:①可与养老业开发相结合。随着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65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总人口的7%,养老已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大产业,应成为乡村旅游开发的方向之一。②与教育开发相结合。

成都是西南最大的花木生产基地之一,许多村落有条件开发成大的“自然教室”、“花卉教室”。一些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村落还可开发为“农村社会实践基地”、“生态环境示范基地”,一些具有革命历史的地区还可以开发为红色旅游基地。③与体育健身相结合,并制造轻微的冒险经历。可以与近年来兴起的拓展旅游相结合,以满足年轻旅游者追求独特的休闲经历的需要。④与探亲访友市场开发相结合。探亲访友型旅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弹性的,而且重游率高。由于影响亲友在目的地旅游活动的是当地居民,城郊便捷的交通条件和相对廉价的消费水平容易为当地城市居民接受。

4.2 关于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的多方支持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至关重要^[1,2]。成都的情况也是如此。成都为花果之乡,农业资源丰富,乡村民俗多姿多彩,龙泉驿区发展旅游的资源条件并不比其他地区优越。但从1992年以来,当地政府每年从举办以赏桃花为主的“桃花会”,到融入客家文化的“桃花节暨客家学术研讨会”,针对淡季过淡的现象,又策划宣传了“赏果节”、“花博会”。与此同时,对“农家乐”实行“三证”管理和实行统一收费标准,指导农民增设旅游项目并对其进行培训,营造了较好的旅游环境,使该区乡村旅游的形象逐步树立。政府的扶持和规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我国乡村旅游大多是在政府倡导下,个人或小群体自主开发形成的,政府对乡村旅游的支持也是很有限的。目前比较突出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管理,另一个是资金。农民在技术上先天不足,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与外来投资者有差距,需要政府的帮助,应当说,这个问题当地政府是可以作为的,例如组织农民外出考察、聘请相关专家进行规划指导和培训。另外农户由于资金不足造成“农家乐”规模难以扩大的问题也很突出。由于目前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加上农民没有社会保障,使农民成为先天的风险规避者,没有也不敢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旅游开发中。这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一时难以彻底解决,但当地政府是否可以出台一些政策,让农户经营者可以获得小额的贷款,帮助他们实现“农家乐”的上档升级?

如前所述,成都农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利呈下降趋势。有些外来老板投资经营的“农家乐”,连服务员都是从老家带来的,当地农民除了可以从租地中获得一点收入外,几乎没有参与到旅游中去。若任

其发展,乡村旅游地区必然成为“飞地”,不能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农户的利益,提高社区参与旅游的程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应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是政府普遍希望引资扩大“农家乐”的规模,以增加当地税收,至于农民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则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在笔者调查的泸州杨桥景区和张坝桂圆林农民抗议政府收门票,理县桃坪羌寨村民自发成立验票队以维护自身利益就是其中几例。政府与民争利必然引起矛盾,而矛盾的爆发也会影响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当地农民、外来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的利益,达到多方共赢?政府也是利益主体,在旅游研究中应有充分的认识。目前大多旅游规划中缺少如何协调各方面利益板块的研究。而只有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规划才能得以真正的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

致谢:感谢四川省旅游局、成都市旅游局、郫县旅游局、龙泉驿区旅游局、双流县旅游局、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政府和虹口乡政府为调查提供了方便。

[参 考 文 献]

- [1] Bramwell B, Lane B. 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C]. UK: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1994, 1-6.
- [2] Fleischer A & Felsenstein D. Support for Rural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4): 1007-1024.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s Urban Suburbs: A Cas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Nongjiale* in Chengdu

HE Jing-mi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suburbs of China through a cas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Nongjiale*, especially analyzing its tracks of the changing patterns,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cultural impact on rural areas in Chengdu.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cale of *Nongjiale* in Chengdu is becoming so large that it's similar to the holiday villages. Meanwhile, competing with the other investors in economic benefits of *Nongjiale*, the local villagers are at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therefore *Nongjiale* is becoming "flying-lan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only way can be taken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to create some new patterns for *Nongjiale* and enforce the suppor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evolution; *Nongjiale*; Chengdu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廉月娟]